



世纪前沿

Power and Prosperity

[美] 曼瑟·奥尔森 著

Mancur Olson

苏长和 嵇飞 译

权力与繁荣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架建议：经济

ISBN 978-7-208-



9 787208 121263 >

定价：3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权力与繁荣

[美] 曼瑟·奥尔森 著 苏长和 嵇飞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与繁荣/(美)奥尔森(Olson, M.)著;苏长和,
嵇飞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Power and prosperity
ISBN 978-7-208-12126-3

I. ①权… II. ①奥… ②苏… ③嵇… III. ①行政
干预-市场经济-研究 IV. ①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1129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范蔚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权力与繁荣

[美]曼瑟·奥尔森 著
苏长和 嵇飞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
插 页 4
字 数 165 000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126-3/F·2222
定 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权力与繁荣

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日前打电话来，希望我能为奥尔森教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写一篇导读。老实讲，对此我很犹豫，因为关于奥尔森的文章，我先后写过几篇，其中的一篇还特别提及奥尔森和他的这部遗作。令我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奥尔森在马里兰大学的同事查尔斯·卡德韦尔已经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在序中，卡德韦尔概述了本书的核心观点，点明了作者的方法论，总结了奥尔森整个学术生涯的精华。我如果再去重复，总觉得有画蛇添足之嫌。后来我之所以没有婉拒，除了受到热情邀请之外，还在于我觉得有一种义务在这里进一步谈谈我对奥尔森教授理论的理解。毕竟在马里兰，我在他的指导下阅读、思考了一年。

社会科学研究，我以为大致可归结为三大类问题：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二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三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涉及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个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与之相关的概念有：分工、交易、企业、市场、契约、外部性等。中者关心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如何恰当地规范政府行为以有效地保障个人权利。与之相关的概念是：财产权利、利益集团、政府管制、合法性、公共产品等。后者注重一国内部不同层次政府之间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博弈。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相容利益、主权、国家兴衰等。毋庸讳言，上述三大类问题在许多地方又是相互交叉、彼此重叠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行为来界定的，而某国政府的行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日益受到他国政府行为的制约。至于集大成者，如果存在的话，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可算一支。

政治学的核心范畴为权力，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为国民财富之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即探寻繁荣的本源。繁荣来自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后者源于每个人的劳动创造和巨大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的实现；以上又导因于分工与交易的深度与广度，而后者又滥觞于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受到保护的程度；能够实施有效权利保障的唯有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或暴力；鉴于政府既由人组成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个人或集团的影响，故它同时又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最大威胁；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衰败；繁荣与衰败在国家林立的国际环境中方会凸显其意义；由此，经济上繁荣与否的问题便转换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与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权力与繁荣，或更具体、更极端地说，权力先于繁荣，或强制性规则先于自愿交换，或政府决定增长（因为没有政府，个人权利便无从谈起），乃贯穿奥尔森政治经济学始终的逻辑脉络。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难以遏制的别出心裁加以解释的冲动，使奥尔森独秀于经济学家之林。概言之，奥尔森提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过程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的兴衰》（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力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

这里需要特别感谢卡德韦尔教授。正是从他为《权力与繁荣》所

撰写的序言中，我们得知在 1997 年秋天，也就是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前的四个多月，奥尔森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也恰恰是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奥尔森创造了一个可以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尽管这个概念没有来得及添加进这部著作的草稿中，但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它逐步形成的轨迹。奥尔森在书稿中反复且多角度论证说，经济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第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话说到此，“强化市场型政府”便呼之欲出了。

强化市场型政府设立的目标，在于获得所有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为此就必须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和政治秩序来强制执行合同或抵押协议，提供负有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安排，并且保障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及有效的运转。在这里，财产权利、契约权利以及由此催生的资本市场，便成为区分市场强化程度之“色谱”的尺度，其两端分别为产权高度密集型和产权高度粗放型，各国的经济也就可以依此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显而易见，为创新提供必要资本支持的金融市场属于高度契约密集型产业，因而对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依赖性特别高。当把贸易领域和生产领域联系起来考察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产权密集型的经济通常对应的是资本密集型经济。其背后的逻辑十分简单，如果机器或工厂总是面临着被没收或充公的风险，人们就不愿意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这也顺带解释了在“产权—资本粗放型”经济中，往往是那些具有自我保护性质的产业比较发达，比如人力资本密集的手工业和种植业。

在实现了权力与繁荣的“对应化”或“因果化”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产生的逻辑或条件是什么？这里我们必须稍微深入讨论一下奥尔森首创的那个基本而意义重大的概念：相容利益。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

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容利益。共容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与之相对的是拥有“狭隘利益”的个人或组织。鉴于它们只能享有或丧失社会产出增减量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故他们对增加社会产出毫无兴趣，而仅热衷于再分配以寻求该社会产出的更大份额，甚至不惜损害社会福利。依据这样的逻辑，只要存在共容利益，即使是早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都会尽可能地保护个人权利，按照最优税率税则对其臣民征税，而不会竭泽而渔，以避免损害其收入长期最大化的目标。

经过这种转换，强化市场型政府的产生条件，也就等价于如何使政府或执政者具有共容利益的条件。对此奥尔森的回答是：民主政体，或至少是代议制政体。注意，奥尔森谈论的民主，其核心或本质不在于它是否赋予普遍公民选举权，而在于它是否保证了政府产生于自由的政治竞争过程，从而确保拥有共容利益的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他的这一思想倾向，与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所持的立场如出一辙：政治的民主原则，即应该从争取选票的竞争性斗争中产生出来；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人民总是可以被定义弄得他们像是在统治；除了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言论和出版自由之外，民主和自由就没什么关系了。尤为令人深思的是，对民主有类似想法的人远不止熊彼特和奥尔森。譬如，早在1926年，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卡尔·施密特就曾写过一篇题为《论议会制和民主制的抵牾》的文章（载其《政治的浪漫派》）。他说，所有人作为人的平等，不是民主，而是某种类型的自由主义；让最优秀最有能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并承担公共事务，才是议会民主制的本质。

那么历史上和逻辑上的民主政体又究竟是如何起源的呢？换言之，由一个封建专制君主取代另一个封建专制君主的“常规”何以被打破呢？奥尔森的回答简洁而睿智：某种特殊情况的出现，或曰偶然

性。当那些促使封建专制王权垮台数量不多的人物、家族或集团之间的权力出现了平衡时，也就是说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够强大到使自己成为新的封建专制者时，民主政体也就有了可能。这一逻辑成立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不管是由于地理的还是其他幸运的环境因素，这个民主政体能够免遭周边国家的征服。许多历史和归纳研究证明，英国和美国等一些代议民主制的“自发产生”，便与上层权力的多元、平等分配和领土安全密切相关。虽然奥尔森在参考文献中没有提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但从其著述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发现阿克顿的影子。在《法国大革命讲稿》（1910）中，阿克顿反复地表达过他对“自由政体”的理解：政治科学强烈要求，必须靠多元和分立来操纵权力。

本书的一个辅助性的、但同时却是有趣的观点，是奥尔森对所谓“科斯定理”的批判和拓展。在他看来，科斯理论的核心在于交易成本和自愿交换，其基本结论是人们会为了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对此奥尔森评价说，“科斯定理”（亦即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个人理性可以通向集体理性）仅仅适用于集体规模很小的情况。一旦集团成员足够多，即使交易成本为零，其成员也不会受到激励去为集体产品的提供做出贡献，因为这时搭便车的潜在收益相对会更高。再者，科斯的理论只注意到理性的自利会使自愿交换产生互利结果，却忽略了理性的自利也会引导人们用手中的权力强迫别人就范的可能性。恰恰是后者才是解释政府的不同类型——强化市场型政府还是作为其对立面的政府——的有效工具或途径。还有，源于自愿交换之收益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契约的执行，而“契约如果没有剑作保证则等于一纸空文”（霍布斯语）。有鉴于此，奥尔森把强化市场型政府视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

关于发展中国家，奥尔森的逻辑结论认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发现发展

中国国家政府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小的。这一结论对于身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之国家的读者而言，初听来多少有些振聋发聩。但在知晓了奥尔森所青睐的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之后，我们便可以依据如下三个指标对政府之功能加以比较：规模，结构，方式。仅就规模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逊色于发达国家，这至少可以从政府雇员数量之众多和干预领域之广阔上得到反映。但就结构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政府重点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力度往往大相径庭，其关键差别集中体现在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他人或政府本身的侵犯上。要知道，人类生产的一个悲剧性原理在于：毁灭容易创造难，正如积长年心血建成的大厦会以一根火柴的代价而毁于一旦。在这里，强化市场型政府存在的意义又一次凸显出来。至于方式，则既涉及组织分工的原则和执行原则的手段，还与政府权力来源有关。

个人权利得到最有效保护的国家同时也是拥有最高人均收入的国家，或者说，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是因为它们缺乏可靠的个人权利，构成了奥尔森在本书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当今世界的现实应该讲与这种判断相当吻合。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我们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损害个人权利的掠夺行径，不仅来自封建专制政府或君主的无端没收和无政府状态下随处可见的侵权，也来自国家间的野蛮掠夺，其中也包括那些源自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文明”盘剥。昔日残暴的殖民者今天摇身一变都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和它们现在都是最为“尊重权利”的国家一样，恐怕也并非出于历史的巧合。对这个近似于“鸡”与“蛋”的、同时也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奥尔森在书中予以回避了。他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此，我们已无从知晓了。

对奥尔森的主要批评之一是针对他那简化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模型。有些人称他为“理论单一”的思想家，即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且复杂的问题。其实，这恰恰是奥尔森之所以是奥尔森而非其他经济学家的根本所在，也是他毕生所追求的学术目标。奥尔森终身恪守如下的学术研究信条：“正如伟大的斗士总是力求刺中敌手的颈动脉

那样，伟大的科学家总在寻找能够取得突破和具有强烈诉求的问题。故我以为，探求那些重大和高度简化的命题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战略。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自认为一直是这样做的。当然这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对此肯尼思·阿罗评价说，奥尔森凭借简单模型对重大命题所做的解释，大都很能说明问题；奥尔森去世之所以是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就在于他与众不同，而其他经济学家大都相去不远。虽说他的思想形成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但我感觉奥尔森心目中的精神英雄是达尔文。他在多种场合都表达过对达尔文的敬意，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简洁、解释力强、而且覆盖面广阔。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8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两周后《经济学家》杂志便发表了讣告，并在其遗像下配了一行说明词，把他称为“利益集团的鞭挞者”。该文在结尾处还做了一个合理的猜测：如果奥尔森仍然健在，那么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尽管不是完全没有争议，却很可能把他送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在奥尔森去世两周年之际，《经济学家》杂志又发表专文，评介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该文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三年前我阅读此书时便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念头。后来我一边让我的学生李增刚翻译，一边联系出版社。当完成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也表示愿意出版时，我却得知该书的中文版权已经被颇具慧眼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买走。虽不无遗憾，但毕竟中国读者可以看到这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了。当然，作为美国经济学教授，奥尔森的某些思想倾向、学术观点和秉承的理论传统，和当今中国的主导思想或观念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在阅读此书时，我们还须以了解、批判、借鉴的眼光对待之。

张宇燕

2004年12月30日

序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思考着权力如何与繁荣相关的问题。其实，早在 1340 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斯伊纳（Siena）共和国的领导人就委托艺术家创造了两幅壁画，壁画的主题就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由安布鲁吉奥·劳伦扎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造的这两幅壁画，占据了整个斯伊纳九人统治委员会的议事厅，壁画的题目分别是《坏政府的寓言》和《好政府的寓言》。壁画为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早期的而又简化的看法。

在劳伦扎蒂的壁画中，坏政府是由一位暴君的肖像所代表的，他坐在断壁残垣前，主持邪恶堕落的政务：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如此等等。围绕着暴君形象的是各种各样的掠夺行为，例如战争、犯罪和对正义的践踏，它们均以中世纪公共艺术特有的戏剧和服饰表达手法表现出来。相反，在墙的右边，有个共同的善的形象，主持着诸如以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为代表的好政府的事务。^[1]《好政府的寓言》里面的人物形象分成值得注意的两组。一组是士兵与囚犯，而他们的左边则是一群政务官员。这两个次要场景涉及的主题在奥尔森的书中得到特别的注意，其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运用及在这一运用过程中市民的作用。

与好政府的壁画相联的是两个画面，即好的城市和好的国家。这两幅画面展示了在成功的治理安排下出现的繁荣景象。在好国家的壁画中，农民在富足的土地上忙碌着，毛驴载着谷物在小山上悠闲地走着，它们的目的地则是好城市壁画中繁忙的市场。好城市周围则是载歌载舞的人们，街上热闹非凡，建筑物富丽堂皇。这些壁画对展示当

时斯伊纳共和国内部的治理状态很有意义，但是委托做这些壁画的政权在 1355 年由于瘟疫和查理四世的外部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利益纷争而崩溃了。斯伊纳的发展立刻停顿了，但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很丰富的中世纪生活的博物馆，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善治的脆弱性。

在这些壁画之后的 636 年，一位新闻记者的问题促使奥尔森去追问为什么在坏政府崩溃以后不会出现经济繁荣呢？劳伦扎蒂用壁画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奥尔森则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在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本书就是奥尔森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

奥尔森认为经济成功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没有掠夺行为。他注意到，这些条件以及由之而来的最好的经济效果，在那些制度能够使权威性的决策服从全局而不是狭隘利益，以及权利得到完全尊重的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可靠性最大。奥尔森指出，这些制度安排揭示了政府经济增长的类型。在小集团或者孤立的市场中，可能有契约的强制执行以及财产体制，而需要增长的复杂市场的发展则不能没有政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约束，就很难发展可信的财产或者契约执行体制。

奥尔森在对这个结论的研究中，予以苏联及其后继国家特别的关注。但是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许多还没有达到经济繁荣的地方。就如劳伦扎蒂的壁画所清晰表达的，奥尔森看到了壁画背后的东西，因而去问为什么有些政府能够提供支持市场成长的公共物品而有些政府则抑制了繁荣的出现。

劳伦扎蒂壁画中内容的反差涉及的其实是治理的结果问题，但是关于后共产主义的辩论常常把国家与市场看作是不能比较而不是互相补充的两个东西。这种观点对历史上反市场的苏联来说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奥尔森指出，它对我们理解那些国家在促进繁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地方却是没有帮助的。

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崩溃程度的差异，以及经济恢复速度的不同，与国家的强度以及国家如何运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外部投资和国内投资的水平，新兴私有公司的增长以及其他转轨措施的运用，取决于国家提供基础制度以及克制自己掠夺行为这些因素。如果法院不能可靠地执行合约，或者法官不能强制执行合约，或者国家及其官员与私人投资纠缠在一起，那么国家就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普遍的结论很容易就能做出来，但是奥尔森对政权的类型以及治理与影响增长的制度之间互动的特殊性还是给予了非常缜密的分析。

在写完本书的草稿之后，奥尔森创造了一个概括何种政府可以获得繁荣的词语。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如何提供强化市场型的制度安排确实是个包罗万象的问题，例如，从适当的法院和合约执行，到政府财政活动的管制或者教育的开放，等等。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所强调的这些问题确实是现在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说明强化市场型政府重要性的一个特殊例子是资本和信用市场，这些市场对制度的敏感性引起了奥尔森的注意。奥尔森问道：为什么在许多国家，技术和制度允许成万亿美元的资金跨国界流动而在国家之内金融资本的流动量则非常小？当然，银行和银行管制的信息，以及资本市场运行的信息是完全公开的，而且实际上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也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大量的美元被捐助于专家和地方官员的培训，以帮助他们掌握更充分的资本和信用市场方面的知识）。就如奥尔森对其同事所指出的：

在最繁荣的国家，资本市场、保险以及衍生产品和期货贸易量是如此之大和重要，以及资本的密集性和大规模的公司生产是如此广泛，以致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创造更多的市场而不是压制